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3.003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语境论析

莫雪玲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在社会巨变和转型时期,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导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近代文化传统趋向经世致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月革命后掀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潮,同时通过中国思想界一系列论战的学理论辩,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锻炼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上诸要素的总和,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内在语境。

关键词: 早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语境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3-0010-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变迁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何以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及中国化,哪些因素确保了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本文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内在语境进行阐释。

一、中国的社会变化

1.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马克思认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1]20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要求。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将中国变为其永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战争最终导致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地位。随着列强一步步加深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中国的经济构造在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也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独立和完整。在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下,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格局,使本来就已经滞后的中国既失去了封建社会自成系统的运行条件,又缺乏资本主义社会趋利向前的近代气息,传统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的边缘。国家主权残破,民族危机加深,封闭僵滞的思想文化系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

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占领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大举入侵中国,孤立封闭的中国被迫进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洪流。这一进程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同时也让中国卷入了被动畸形的现代化道路。从此,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中国能够摆脱这一被动局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意识也日益增强。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创刊周年纪念特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2]110}。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新科学理论的指导,现代化进程对于科学理论的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基础和根

收稿日期: 2016-0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13BKS017)

作者简介: 莫雪玲(1975-),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sysz2009@163.com

本原因。

2. 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由前所述，当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时，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意识形态，已愈来愈成为社会变革的严重桎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必然导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造成了“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3]552}，导致“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4]460}，从而“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4]461}的局面。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也因此而形成，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5]26}。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爆发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无论是封建士大夫的改良，还是带有妥协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都仍未能真正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不断觉醒，工人运动有了长足发展，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爆发后，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革命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工人阶级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的文化生态

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人们生活的文化生态深远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变迁，由此导致的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使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西学东渐”的文化冲突

在中国，儒家思想自古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

“经世”在《辞源》中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可见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之后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和宣传，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以改变世风，挽救国家为目的的“存天理，灭人

欲”的社会伦理准则，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实上的对立很难做到学以致用，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等思想家，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致用”在《辞源》中的解释为：尽其所用，“经世致用”意指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可见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由龚自珍、魏源等借“之”以言世务，到光绪年间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亦以汉代今文经学为其方法论的指导，从《春秋·公羊传》中引申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为现实改革服务，甚至20世纪初再次兴起的古文经学也开始注意经世问题。经世致用的学风在近代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变革，促使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及世界潮流的关注，把研究的视野从中国的实学扩大到研究西方的西学，由此进一步最终导向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在中国文化史上，东汉之后的佛学西来和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是外来文化进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次。早在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就开始了接触与交流。利马窦等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也一起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打击。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优于西方近代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而在物质及科学技术层面率先开启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及冲击，清末洋务运动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体西用”论力图以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即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加强和巩固儒家道统主体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建立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又能体现中西合璧的“新文化”。“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种可能的文化模式，既有着一定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但同时也因其极大的保守落后性而日益成为发展“西用”的障碍。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创刊的《新青年》为阵地，高举科学与民主两

面旗帜,发起了以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复古思想进行了深入批判,主张以最彻底的态度向西方寻求真理,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提高国民的觉悟和素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五四”之后,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等问题,形成了“中国文化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两大阵营。由陈立夫、陶希圣等提出“中国文化本位”论,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取舍中西文化,实质上仍旧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以梁漱溟、张君勱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主张以东方文化去改造世界,夸大西方文化的危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针对“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等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全盘西化派”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文化,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观点无疑完全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文化交流的可选择性。20世纪30年代,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采取批判继承态度的新文化主张逐渐形成,这就是后来由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概括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二者的论争,同时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从“中体西用”、“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历史的世纪进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交流、融合,各种文化观点的针锋相对与相激相济,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在古今中西各类文化的激荡与整合之中,代表和反映着中华民族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为了中国文化最终的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选择。

2. 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

从史料看,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最早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外国传教士。据资料记载,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英国人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胡治谷通过广学会印行的有关书刊,广学会是基督教会于近代在上海设立的一个以翻译、介绍西方书刊典籍为宗旨的

机构。广学会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讲述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是《泰西民法志》,该书第七章在介绍马克思时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朋友昂格思(即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6]20世纪初,中国报刊开始大量出现关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是篇幅最多的。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提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文中在介绍马克思对进化论的批评时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梁启超还引用颌德的评论介绍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当今德国“最占势力”的思想之一,“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4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至48号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做了简要介绍:“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的一些人亦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介绍。1905年11月,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民报》刊登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以及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学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一时成为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不满意现存社会种种组织而“应时顺势”、思以改良的思想学理。1915年到1918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期间虽然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启蒙的过程中,也有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爆发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成为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最重要促成因素。毛泽东1949年在回顾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时说:“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1417}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并形成了宣传的热潮。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界接踵发生了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中遭遇到了初步的挑战。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通过学理论辩,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在学理论辩中,也锻炼了一支努力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以其自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斗争中发展,在比较中传播,并且在不断地和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论战中成为主流。许多激进自由主义者在文化论争与辨析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推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内在语境因素,势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真正地适应于中国的国情,并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功运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能够满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诉求。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黄见德.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中央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姚巧华.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叙述[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 [6] 丁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现实意义[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73-75.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 Study of the Internal Context of the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O Xue-l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upheaval and transition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ever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which led to the double appeals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Thu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s promoted with the tendency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in the modern culture and 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of Chinese-western culture. With the spreading boom of Marxism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ations in Chinese thinking public, Marxism sprung everywhere and gave prominence to its powerful vitalit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tingents of Marxism have got forged in the early tim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 internal context for the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the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inization; internal context

【编辑 王思齐】